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李帆
编

刘师培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李帆
编

刘师培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刘师培卷/李帆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0-20638-7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刘师培 (1884~1919)-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5861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刘师培卷

李帆 编

Liu Shiwei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33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32 000	定 价	7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澍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 19 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 1840 年到 1949 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 1840 年至 1949 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刘师培是近代中国的著名学者和政治人物。他不仅在政治舞台上令人瞩目的表现，即在学术领域里能与章太炎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业已表明他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的确，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中尤其是在近代思想、学术史上，刘师培发挥了重要作用。姑不论其政治上的功过是非和宣扬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所做的大量工作，仅就其思想与学术而言，其所达到的深广度不仅独步一时，即使今天看来，某些方面仍相当深刻，仍有汲取和借鉴的必要，值得深入探索和研究，并在价值系统上予以阐释。

—

刘师培，字申叔，一字鲁源，号左龢，曾改名光汉，化名金少甫，笔名光汉子、光汉人、世培、激烈派第一人、申、韦裔、豕常之裔、无畏等，清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二（1884年6月24日）生于江苏扬州。

刘师培先祖“自溧水迁扬州，世为仪征人”^①。清代扬州府治，领二州（高邮、泰州）、六县（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东台）。该地位居江淮之间，大运河纵贯南北，历史悠久，文化璀璨，向为人才辈出之所，而且学术素来发达，清代朴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等皆为该地学者，有“扬州学派”之称。刘师培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都以治《春秋左氏传》而闻名，亦为“扬州学派”成员，其家门前署联“红豆三传，儒林趾美；青藜四照，宝树联芳”^②，可见其家风。

① 刘师培：《先府君行略》，《左龢集》卷六，见钱玄同等编：《刘申叔遗书》，125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② 李详：《李审言文集》上册，6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刘师培生于这一经学世家，自幼濡染家学，8岁学《易》，12岁读毕四书、五经，15岁前后治《晏子春秋》和学《毛诗》郑笺、《尔雅》、《说文解字》诸书，并大量阅读周秦典籍，打下厚实的古典学问基础，加之聪颖过人，勤奋刻苦，随着年龄增长，功力愈益深厚。“未冠即耽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任。”^① 时人盛赞其才：“笃嗜左氏春秋，研经而外，并及子史。其答客难也，尝证穆王西征之事；其应射策也，历举苗岗种族之数。出语惊其长老，记问冠于朋从。”^② 他起初科举颇顺，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被录为生员，次年即得中举人。但在二十九年（1903年）的会试中却失利落第，自此绝意科场。

此时，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中，革命党人以排满兴汉为职志，正在各地开展推翻清王朝的斗争。刘师培少年时便具排满意识，心怀救国之志。科举失利后，来到上海，结交章士钊、陈独秀、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开始投身革命运动。他以激进著称，“主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遂更名‘光汉’。”^③ 又自称“激烈派第一人”，陆续发表大量文章，如《攘书》《黄帝纪年说》《中国民约精义》（与林獬合撰）《中国民族志》《论激烈的好处》等。《攘书》曰：“攘，《说文》云，推也，段注以为即退让之义。吾谓攘字从襄得声，辟土怀远为襄，故攘字即为攘夷之攘，今《攘书》之义取此。”^④ 所谓“攘夷”，实即为“排满”。《黄帝纪年说》主张强化汉族认同，指出：“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⑤ 并提倡改用黄帝纪年，以唤起同胞的民族自觉。《中国民约精义》是从《周易》《诗经》《春秋》《论语》《孟子》等上古之作直到近人魏源、龚自珍等数十人的作品中辑录出与民约之义相关的议论，加以案语解说之，以此介绍和阐发以卢梭《民约论》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学说。可见这些文章都是针砭时政、阐扬革命、力主排满兴汉之作。由于刘师培思想敏锐、学术功底深，文章写得有理有据，故产生很大影响，被誉为革命派中少有的学问既佳、笔锋又健的宣传家。

① 尹炎武：《刘师培外传》，见《刘申叔遗书》，17页。

② 刘师颖：《刘申叔先生遗书跋》，见《刘申叔遗书》，2407页。

③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总目后记》，见《刘申叔遗书》，5页。

④ 刘师培：《攘书》，见《刘申叔遗书》，630页。

⑤ 刘师培：《黄帝纪年说》，见李妙根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光绪三十年（1904年），刘师培在革命派所办《警钟日报》主笔政。同年，娶同邑何震为妻，并加入革命团体光复会。三十一年（1905年）初，加入邓实、黄节等发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该会宗旨是“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并办有机刊物《国粹学报》。刘师培为《国粹学报》主要撰稿人，在《国粹学报》上先后连载著作33种。该刊共发行82期，除2期外，皆有其诗文。不久，《警钟日报》被查封，刘师培遭通缉，被迫逃至浙江嘉兴。又应陈独秀之邀，赴安徽芜湖，在安徽公学、皖江中学任教，化名“金少甫”。他在课堂上宣传反清革命，并以当地光复会负责人的身份在学生中发展新会员，组织名为“黄氏学校”的秘密团体，从事暗杀活动。三十三年（1907年）初，携妻何震东渡日本，面见孙中山，正式加入同盟会，成为《民报》撰稿人。

到达日本后，刘师培所看到的同盟会领导层的状况和日本社会的状况是令他失望的。一则同盟会内部各派的纷争和作为书生与孙中山等“行动派”人士相处的不融洽，使得他在心理上产生了挫折感；二则日本社会俯拾皆是弊端和不如人意处^①，令他对排满兴汉建立新政权（效仿西方和日本）的目标产生怀疑，信念开始动摇。这种情形之下，正逢不满现状的日本社会党“硬派”在大力宣扬无政府主义，自然也就令刘师培有了接受它的思想基础。因无政府主义所欲达到的目标既避免了现存社会包括西方（日本）民主社会的弊端，又超越了中国革命党人排满兴汉所要达到的目的——建立类似西方民主政权的汉人政权，这两方面都恰适合他此时的心境与要求。加之好友、同样不满孙中山的章太炎、张继也倾向无政府主义，并为他引见结识幸德秋水等日本无政府主义者，更促使他倒向无政府主义。另外，就像一些人所指出的，他个性上的弱点，如“务名”、“厥性无恒，好异矜奇”^②等，亦使他善变和易于趋向更激烈的事物，而无政府主义思想恰是比革命党人之排满兴汉主张更激进的学说，在对革命目标失望的情形下采纳此一学说，在他那里是又“激烈”了一次，符合其性格逻辑。

① 刘师培曾观察到，“欧美日本，世人徒震其外观之文明，然按其实际，则平民之苦，有远甚中国者”，“欲穷文明国之实际，则曷向日本东京本所区，一观日本贫民之况乎！”见申叔（刘师培）：《论新政为病民之根》，载《天义》第8、9、10卷合册，1907年10月30日。

② 陶成章说：“光汉之性务名”；刘师培之叔刘富曾也曾感叹：“侄得名太早，厥性无恒，好异矜奇，稍急近利。”见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刘富曾：《亡侄师培墓志铭》，见《刘申叔遗书》，16页。

在日期间，思想上转向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与张继一同组织了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并通过何震创办《天义报》，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发表《废兵废财论》《人类均力说》《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等文。与此同时，刘师培也未完全放弃排满兴汉之革命宣传，他在《民报》及临时增刊《天讨》上发表《普告汉人》《辩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文章，揭露清廷种种暴政，号召人们起来“讨满”，并驳斥了保皇派的一些论调。这些文章颇受好评，尤其是《辩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得到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激赏^①，在当时发挥了较大作用。刘师培所以能在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同时继续以往的革命宣传，是因起初与无政府主义学说接触时日不长，尚处在理解消化阶段，出于思想惯性，还不能一下子舍弃原有理念，加之身为革命党人，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文章，自然要宣传革命派的主张。与之相对应，他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则皆在《天义报》发表，恰好表明他心目中两报的分工。他曾说：“实行无政府，则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均该于其中，若徒言种族革命，决不足以该革命之全，此无政府革命优于种族革命者也。”^②可见在他眼里，无政府革命是超越性的革命，种族革命远远不能及。

刘师培的激进若仅限于以无政府主义越过民族主义，从而在思想上独树一帜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在思想认识上一步步涉入泥潭，直至投向清廷。刘师培出自经学世家，古学功力深厚，谙熟中国历史，所以他思考问题往往会从这一基点出发，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也是如此。通过研读无政府主义的文献，他对幻想中的无政府社会的特征有了一定认识，相较之下，觉中国社会和欧洲、日本不同，国情特殊，与无政府社会最为接近，即“中国自三代以后，名曰专制政体，实则与无政府略同”，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一切之政治，均生于学术，而中国数千载之学术，悉探源于儒道二家。儒家虽崇礼教，然仅以德礼化民，不欲以政刑齐民，醉心于无讼去杀之风，一任人民之自化，此固主张非干涉者也。道家若老庄诸子，则又欲废灭一切之人治，

^① 章太炎说：“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乎！”见万易：《刘师培》，载《仪征文史资料》，1984（1）；胡汉民回忆道：“刘素长掌故考据之学，文亦雅，余与精卫甚倾赏之，杨度更不能反驳。……光汉文出，遂无复言汉满同源以惑众者。”见《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1981（2）。

^② 震（何震）、申叔（刘师培）：《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载《天义》第6、7卷，1907年9月1、15日。

一任天行之自然，制度典则，弃若弁髦，则亦主张非干涉者也。夫中国之学术既以非干涉为宗旨，故中国数千年之政治亦偏于放任，视人治为甚轻。……自东汉末年，以迄于今，悉为放任之时代。……举国之中，无一有权之人，亦无一奉法之人，政治之放任，至此而达于极端。……故中国现今之政俗，最与无政府相近。”^①从这段话来看，阐发最激进学说的言辞已含有最保守的义蕴，刘师培日后的投向清廷，于此可见端倪。即按照他的逻辑，无政府革命是比民族革命更激进的革命，要实行无政府主义，自然没必要搞民族革命；而中国社会却又最接近无政府社会，固然它亦存弊端，欲矫之，“惟有实行无政府”，但此非一朝一夕之事，“若于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②。与这样的政府合作，促其从接近无政府的状态走向完全的无政府，方为上策。所以，在他那里，投向清廷并非从“激进”剧变为“保守”，而是为实现无政府“理想”又激烈了一次。或者说，他心目中的“激进”已与众人心目中的“保守”画了等号。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底，刘师培暗中向清两江总督端方自首，作《与端方书》，提出十条“弭乱之策”以镇压革命党人。^③三十四年（1908年）《天义报》停刊，刘师培再创《衡报》，继续宣传无政府主义。但因与章太炎关系破裂以及《衡报》被封，无法在日本立足，遂于年底携妻归国，放弃无政府主义。随后至南京，公开投靠端方，出任两江督辕文案兼三江师范学堂教习，为端方考释金石。

宣统元年（1909年）起，刘师培的政治、学术生涯进入一个新阶段。先是和出任直隶总督的端方一同北上天津，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不久端方被革职，刘师培仍留其幕中，考订金石外，利用端方府多藏善本的便利条件，治学不辍。宣统三年（1911年）秋，端方被起用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由湖北率新军一标前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刘师培随行。途经四川资州时，端方被哗变的湖北新军杀死，刘师培亦被四川军政府资州军政分府拘留。

1912年初，中华民国刚一建立，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等先后伸出援手，希望释放刘师培。刘师培获释后，应老友谢无量之请去成都

① 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载《天义》第6、7卷，1907年9月1、15日。

② 申叔：《论新政为病民之根》，载《天义》第8、9、10卷合册，1907年10月30日。

③ 《刘师培与端方书》，见《洪业论学集》，130～1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任教于四川国学院。在国学院期间，与经学大师廖平共事。潜心教学之余，二人在学术上多有商讨，刘师培的学术主张也因而发生一些变化。1913年秋，刘师培离开四川，北上至山西太原阎锡山处，出任阎锡山都督府顾问。不久在阎推荐下，到北京投靠袁世凯，得袁世凯任为公府谘议。1915年刘师培加入“筹安会”，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发表《君政复古论》等文，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张目，被袁封为上大夫。1916年6月袁死后，刘虽未被追究，但亦无法在北京立足，被迫移居天津，贫病交加。

1917年初，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随即援引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职不久，即向蔡元培推荐刘师培来北大任教，以“兼容并包”为办校宗旨的蔡元培欣然同意。刘师培进入北大后，出任中国文学门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指导教师，并为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在北大的几年里，刘师培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展现出中古文学绚丽夺目、异彩纷呈的风貌，既倡“文笔论”，又不为之所拘，整体上把握了中古文学的时代特色，在文学史编撰上有开创之功。鲁迅曾说，中国文学史一类“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①。1919年初，“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的《国故》月刊社在北大成立，刘师培与黄侃出任《国故》总编辑，这是刘最后一次承担文化学术之责。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病去世，享年36岁。他一生著述宏富，主要论著收入钱玄同等所编《刘申叔先生遗书》^②中，计著作74种，其中论群经及小学者22种、论学术及文辞者13种、群书校释24种、诗文集4种、读书记5种、学校教本6种。今人又搜集整理钱氏所编《遗书》之未收者，成《刘申叔遗书补遗》^③。

二

在刘师培短短36年的人生中，政治风暴对其冲击甚大。有学者认

① 鲁迅：《致台静农》，见《鲁迅全集》第11卷，609～6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② 钱玄同等编《刘申叔先生遗书》，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宁武南氏排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重印。按该书初版时，题民国二十五年排印，实则编竣印行在此之后。

③ 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广陵书社2008年出版。

为，刘氏一生中，政治上的特色是“善变”，学术上的特色是“不变”。^① 政治上的“善变”，使得刘师培在政治斗争关键时刻的表现不时为人诟病，也使得其政治思想与主张呈现多姿多彩的面貌。而学术上所谓“不变”的说法，则值得斟酌。因就人物定位而言，刘师培终究是个学者，学术乃其一生的追求和根本建树所在，若说始终问学不辍，即谓“不变”，当然是妥当的；若说学术立场、取向甚至观点主张都不变，则未免不准确。

刘师培幼承家学，为“扬州学派”殿军，其著述所及，涉猎甚广，方面甚多，但最能体现其研究成就的，当为小学、经学和校勘学。这些领域的成就，皆是继承扬州先贤和家学而来，体现出“扬州学派”长于会通、兼容并包的特色。但刘氏学术并非只有这些，他还有现实关怀层面上的新学问，其重要性不亚于甚至高于他的古典学术研究，这种“预流”学问才是他超越包括先祖在内的扬州先贤之所在。

从1903年到1919年去世，是刘师培从事学术研究的17年。钱玄同认为，刘师培之学“因前后见解之不同，可别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为后期。嫠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② 综观刘之著述，确有钱说之特征，钱之分期应属不易之论。

小学系语言文字之学，清人将其视为研究经学的基础，故经学家大都精通小学，不过他们多集中精力专治一二部书，如研究训诂者，以《尔雅》为主；研究文字者，以《说文》为主；研究声韵者，以《广韵》为主。刘师培的小学研究则不像前人这样狭窄，他强调：“训诂者，研究字义之学也；文字者，研究字形之学也；声韵者，研究字音之学也。必三者俱备，然后可以言小学。”^③ 可见他从事小学研究是主张汇合义、形、声三者来探讨的。他前期的小学成就，钱玄同曾归纳为三个方面：“一、就字音推求字义，其说出于黄扶孟、王石隴伯申父子、焦里堂、阮伯元、黄春谷诸先生而益加恢廓”；“二、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所

① 参见朱维铮：《〈刘师培论学论政〉序》，见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②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见《刘申叔遗书》，28页。

③ 刘师培：《正名隅论》，《左龠外集》卷六，见《刘申叔遗书》，1417页。

阐发古代社会之状况”；“三、用古语明今言，亦用今言通古语”^①。这一概括相当准确。其《正名隅论》《小学发微补》《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物名溯源》及《续补》《论前儒误解物类之原因》《骈词无定字释例》《尔雅虫名今释》等著述都阐发了音义相关的道理。如在《小学发微补》中他认为：“惟有字义，乃有字音；惟有字音，乃有字形。”“字音源于字义，既为此声，即为此义。凡彼字右旁之声，同于此字右旁之声者，其义象亦必相同。”^②《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等文是刘师培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所阐发古代社会之状况的代表作，他在这些文章里以大量例证考古史、古事。《新方言序》则是他主张取古语以明今言、亦用今言以通古语的代表作，他曾依此主张作札记三十余条，被章太炎收入所纂《新方言》中。他后期的小学主张与前期大多相反，且明显后退，如对于《说文》，主张墨守，毋少违畔，与前期文中时见的驳《说文》之语正相矛盾；对于同音通用之字，主张于《说文》中寻找本字，反对前期的音近义通之说；对于新增事物，主张于《说文》中取义训相当之古字名之，反对添造新字新词。总之是要一切以《说文解字》为本，不得超越《说文》。这在《古本字考》《答四川国学学校诸生问说文书》《答江炎书》等篇中都强调过，尽管他这方面的学术实践并不多。

刘师培的经学研究前后期也差别较大。前期以实事求是之精神解经，阐发经中粹言，故虽偏重古文，偏重汉儒经说，但不专以此自限。刘氏世传《左传》，自然以古文经为宗，刘师培也不例外，但他并非那种一味拘泥固守的经师，而是倡为“通儒之学”。他曾说过：“仅通一经，确守家法者，小儒之学也；旁通诸经，兼取其长者，通儒之学也。”而且认为：“汉初经学，初无今古文之争也，只有齐学、鲁学之别耳。凡数经之同属鲁学者，其师说必同；凡数经之同属齐学者，其大义亦必同。故西汉经师，多数经并治。诚以非通群经，即不能通一经也。盖齐学详于典章，而鲁学则详于故训。故齐学多属于今文，而鲁学多属于古文。观《白虎通》所采，以齐学为根基；《五经异义》所陈，则奉鲁学为圭臬。曷尝有仅治一经而不复参考他经之说哉？后世儒学式微，学者始拘执一经之言，昧于旁推交通之义，其于古人治经之初法，去之远

①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见《刘申叔遗书》，29页。

② 刘师培：《小学发微补》，见《刘申叔遗书》，429、430页。